

# 从殊俗到慕化:汉晋时期的 西南边疆族群历史书写

孙骁 王丹<sup>1</sup>

**【摘要】** 汉晋时期,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史书中所建构的边疆书写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前代的边疆族群治理在后世的历史书写场域中不断地被回忆和叙述。在“大一统”话语体系之下,随着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的变化,史家对于边疆族群的书写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被塑造为边疆族群书写的典范,奠定了边疆族群夷夏二元一体结构的书写基调。随着后世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入,至魏晋时期,史家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逐渐由“蛮夷”向“夷夏杂居群体”转变。揭示王朝国家时期的历史书写的历史理性逻辑,是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期历史根基的新视角。

**【关键词】** 西南边疆族群 历史书写 历史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K234、K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21)06—0161—09

在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族群研究领域,历代史家对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是重要的研究对象,其对于古代史学思想流变以及西南边疆民族形成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以往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史著为中心,主要探讨某一史家、史著、流派或特定时代的具体历史意识。<sup>1</sup>从研究成果的时间脉络上看,呈现出由历史编纂和史学史的传统研究范式研究史家的著史思想,过渡到史学理论影响下的历史意识研究范式的发展趋势。<sup>2</sup>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处理民族工作时“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sup>3</sup>目前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两种路径。<sup>4</sup>但是,通过历史书写的研究方法,探讨王朝国家时期的边疆族群书写中隐含的民族共同体历史意识的研究,目前尚少。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来看,历代史书对于边疆族群的叙述从夷夏二元结构最终走向了“华夷一家”的统一式书写。从历史书写的视角进行分析,西南边疆族群研究需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代的历史书写中是如何成立的?

本文分析汉代至南北朝时期史籍关于西南族群的历史书写,通过对传统夷夏观的观察,梳理史家对早期西南族群身份的定位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历史观。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文献分析与理论分析,以西南边疆族群书写为对象,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历史根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一、被发左衽:“蛮夷”身份的书写基调

有关西南边疆族群的记载,现有史籍最早可以上溯到《史记·西南夷列传》。《史记》创作于西汉中期,是汉代最为强盛的历史阶段。司马迁《西南夷列传》关于西南夷风俗的记载如下:

<sup>1</sup>**作者简介:** 孙骁,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在站研究人员,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云南边疆民族史研究。王丹,女,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史上边疆与内地交往交流交融历程及其比较研究”(项目号:20&ZD2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部院合作项目)“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经验研究”(项目号:SKYZD201912)子项目“中国古代吏治得失与国家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牂以东，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君长以什数，牂牁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牂牁以东，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sup>5</sup>

《史记》中这段文字对于西南夷的概述简略而全面，内容包括汉初西南夷的分布范围、习俗以及生产方式。当时的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包括夜郎、滇、邛都、昆明、徙、笮等具体部落。西南夷在当时整体发展程度较低，仅在部分地区（如滇）农业已经形成规模，并且出现了大型的聚落，但还没有形成城市。除了对西南夷风俗的描述，《西南夷列传》还记载了西南地区的一段重要历史，即“庄蹻入滇”，司马迁对此事有这样一段描写：

（庄蹻）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sup>6</sup>

在司马迁笔下，“庄蹻王滇”的历史进程，是通过“变服，从其俗”而最终实现的，即庄蹻最终接受了“夷俗”。由“变”“从”等文字的使用可以看出，当时西南夷风俗一定是有别于中原风俗的，《西南夷列传》首次确认了“夷夏”二元体系下西南地区各族群“夷”的身份，当时居住在西南地区的族群作为“夷”的族群身份被首次书写。《史记》中此节明确体现出了汉代史家所秉持的汉文化中心意识，奠定了后世对西南边疆族群身份的书写基调。

西汉在西南设益州郡，但东汉时期因国力衰弱，无力经营边疆地区，边疆防御体系呈现内缩趋势。汉灵帝时期，议郎蔡邕曾言：“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sup>7</sup>应该说，东汉时国力的下降使得“华夷有别”思想有了更大的政治影响，这一观念也在《汉书》中得到了明显反映。班固《汉书》体例基本继承《史记》，其中亦为西南夷做传。相比《史记》而言，《汉书》中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顺位后移，处于列传最末。文本前半部除个别文字以外，基本照搬《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而后半部分记武帝之后西南夷史事，并未涉及当地风土。除基本史事的记述外，范曄还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集中书写了益州郡的数次反叛，史载：

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后三岁，姑缯、叶榆复反……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鉤町王以为侯……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sup>8</sup>

这段文字记载了益州郡从孝昭始元元年（前86）至王莽篡位（约6年）之间发生的4次暴乱。该记载对于西南夷反抗事件的叙述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用“反”字将西南夷反抗事件定性为西南夷对于中原王朝的叛乱。其二，用“民”“蛮夷”“虏”等称谓指代益州西南夷群体。其三，对西南夷“叛乱”的具体情况往往一句略过，而对于中原王朝进行镇压的过程则做详细描述。之所以出现这些特征，是由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秉持着“夷夏有别”的思想，将华夏置于主导地位，而将益州郡视为从属于中原王朝的边陲，西南为未开化的“蛮夷”。从这一立场出发，西南夷的反抗即为不义的“叛乱”，华夏王朝平定叛乱由此顺理成章。

班固在《叙传》中，对西南夷有一句明确的描述和定位，曰：“西南外夷，别种殊俗。”<sup>9</sup>可以看出，在对西南边疆族群的风俗进行书写时，《汉书》受“夷夏有别”思想影响，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严华夷之辩”的态度，这大大强化了后世史书书写中的“礼别夷夏”意识。西南夷“殊俗”“多叛”的族群形象开始在史书中逐渐形成。

在前四史中，《三国志》的历史书写十分特别。此书分立《吴书》《魏书》《蜀书》，别具一格。这自然与汉末以来持续了近百年的割据局面有直接的关系。国家由一统走向分裂，随后又由分裂回归一统。在此过程中，历经亡国之痛的陈寿对于这段历史的书写是委婉而悲郁的。《三国志》尊晋为正统，赵翼《廿二史劄记》称：“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sup>10</sup>但另一方面，陈寿生于蜀，早年亦仕于蜀，故而其书写中又有“不忘旧国之微意也”<sup>11</sup>。换言之，陈寿

的笔下既有对华夏观念的表达，同时也有着对蜀汉政权的追念，这种双重的国家观念使得他对汉末以来华夷关系的书写具有了二元性：即“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的共存，如《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载：

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玁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秦、汉以来，匈奴久为边害。孝武虽外事四夷，东平两越、朝鲜，西讨贰师、大宛，开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sup>12</sup>

从这段传记的书写中可以看出，陈寿接受并认可“夷夏有别”的观念。但需要指出，这仅仅是陈寿站在晋的立场对北方游牧族群的书写。而当书写对象是西南边疆族群，特别是在对与蜀汉政权相关的诸族群进行书写时，陈寿的夷夏观念又有区别——《三国志》未做西南夷传，西南族群的史事散见于其他传记，且多用曲笔，如《蜀书·后主传》载：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永昌郡为云南郡，又分建宁、牂牁为兴古郡。<sup>13</sup>

在这段文字中，陈寿在政区概念上，将南中视为蜀汉治下的“四郡”，是经过“礼仪教化”后的内地郡县，而非未经开化的蛮夷地区。既为“边郡”，那么西南夷在身份上就有别于被视作“久为边害”的匈奴，实际上也将西南区域从“四夷”的地域中移除了。可以认为，陈寿在一定程度上是用“华夏”的身份来定义整体西南族群的。但是，陈寿也并未完全将西南族群等同于华夏族群，如在《蜀书·谯周传》，陈寿引谯周语，称南中地区是“南方远夷之地”<sup>14</sup>；又如《蜀书·李恢传》中，陈寿或称西南诸族为“南人”，或称为“南夷”<sup>15</sup>。但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传记中都没有提及地方民俗，甚至没有刻意提及族别名称。可以看出，受到双重国家观念的影响，陈寿对三国时期夷夏关系的书写具有明确的二元性。在整体华夏族群视野下，对北方族群采取“夷夏有别”的基本书写基调，而面对西南地区族群时，陈寿将其视作“华夏”为主导的夷夏共同体，“用夏变夷”的书写基调表露无遗。这两种书写基调在面对不同对象时有着具体的表现，这看似矛盾的书写意识背后，隐藏的是陈寿政治身份的二元性。

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永嘉之乱后，东晋王朝偏安一隅，面对北方地区内迁族群建立的诸多政权，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南北对峙的现状，另一方面又始终以华夏正统自居，试图恢复对北方族群的羁縻控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魏晋时期史书的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范曄《后汉书》书较《史记》《汉书》而言更为全面，史料取材也更为广博，《宋书·范曄传》中称“乃删众家《后汉书》，以为一家之作”<sup>16</sup>。范曄做《后汉书》，目的在于“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sup>17</sup>，因此在史料择选上十分精细，书写亦特别重视总结经验。

就西南边疆族群史事而言，范氏的书写偏重记述诸族群的文化风俗，以及各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互动关系。《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滇池盆地的风貌及土产：“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怙。”<sup>18</sup>对于益州郡夷民反抗的记述也较为详细，记载了王莽政乱时期益州郡反叛首领“栋蚕、若豆”等人的事迹，王莽派宁始将军廉丹镇压叛乱不克而返的过程，以及文奇太守在益州郡修建池塘，灌溉垦田，受到夷民拥戴的事迹。<sup>19</sup>此外，范曄还记录了东汉建武十八年（42）一次规模浩大的反叛事件：“夷渠种栋蚕与姑复、櫟榆、桥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sup>20</sup>对于这场反叛事件的记录，《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仍然延续了《史记》的叙述模式，以记录中原王朝镇压叛乱的过程和结果为重点。在范曄笔下，蛮夷与汉王朝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范曄认为，尽管西南夷“其人皆椎结左衽”<sup>21</sup>，但随着“往化既孚”，最终也可以实现“改襟输宝”。<sup>22</sup>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纷乱的社会环境下，儒家精英更为关注当时的民族关系及边疆治理办法。范曄对边疆族群的关注是现实性的，也是划时代的。对于如何恢复对边疆族群的羁縻控制，范氏从汉代经营西南夷的史实出发，做了更为积极的思考，他在传论中言道：

（四夷）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兽居谓穴居。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sup>23</sup>

范曄认为，推行教化是改变蛮夷地区既有面貌的有效治理途径。比之《史记》《汉书》所秉持的“夷夏有别”观念，《后汉书》的书写明显地反映出了“用夏变夷”的治边思想，同时也更为强烈地体现出魏晋时期儒家精英对再次实现“大一统”的迫切愿

望。

综合来看，前四史对西南夷早期史事的书写，基本奠定了后世对西南边疆族群的书写基调。具体而言，表现为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强调差异。以“礼”（礼俗、传统风俗）作为区分“夷”“夏”两个族群的基本标准。应该看到，正统观念对前四史的书写基调影响是巨大的，在“华夏正统”的观点下，西南族群处于从属地位。以此为前提，史书中大多着力记述西南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文化差异。这些书写首先都是在强调夷俗的“殊”与“异”，但又并不注重刻画西南族群的风俗细节，而是着重凸显西南族群风俗与汉俗的区别。换言之，前四史中除《三国志》因作者陈寿身份立场特殊，在书写西南时将其视为“华夏”文化区域以外，其余三部史书均将西南边疆地区视作“蛮夷”文化区域。

其二，强调统一。叙事偏重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教化”。早期史家的书写以中原王朝为核心，在叙写西南族群风俗的时候，主要刻画中原王朝对当地风俗的影响与改变，即通过“教化”来实现“用夏变夷”。强调文化的统一，突出夷夏身份的同一性——用夏变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sup>24</sup>此即《后汉书》所谓“往化既孚”，亦即实现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大一统”。

其三，因时而异。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夷夏有别”与“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转换。《史记》的基本基调是以华夏为中心；《汉书》对西南族群的历史书写反映出中原王朝“夷夏有别”“严华夷之辩”的观念；《三国志》既有“用夏变夷”，兼有“夷夏有别”和“严华夷之辩”；《后汉书》则更为强调“用夏变夷”。观念的交替首先是“大一统”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原王朝不同时期国力兴衰与治边政策变化的真实写照。

## 二、向义慕化：国家、个人与族群的文化视野

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了史料的分散与缺失。受资料所限，这一时期的史书书写也往往存在着一些失实、失真的情况。此外，由于南北政权分立，彼此攻伐不断，进一步导致各国史书存在着不同的书写立场。诚如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所称：

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sup>25</sup>

北朝历代政权与西南隔绝，除《周书》外，北朝史书大多不载西南族群史事。南朝国力相对孱弱，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力也十分有限，多以荆州刺史遥领西南。徐文德指出：“自晋永和三年以后至北周之亡然此二百余年，南北朝廷虽不能切实经营南中，而欲声势浩大，故委命持节都督遥领宁州，亦足见中朝虽力不及，而未尝忘南中也。”<sup>26</sup>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秦汉以来由中原移民构成的所谓“大姓”阶层，才是西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他们在史书中常以“多叛”的形象出现。可以认为，受政治格局影响，南朝政权对于西南地区风土的认知也是较为有限的，因此史书中往往会有“失实”的情况存在。

从现有资料来看，南北朝时期的官修史书关于西南族群的记载大多引自前朝史志，或直接不述。仅有的一些记录散见于各朝史书，如《南齐书·州郡志》载：

宁州，镇建宁郡，本益州南中，诸葛亮所谓不毛之地也。道远土瘠，蛮夷众多，齐民甚少，诸爨、氏强族，恃远擅命，故数有土反之虞。<sup>27</sup>

南北朝时期，随着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西南，汉文化在当地的地位逐渐上升，南中大姓的政治影响扩大。而西南边疆族群则逐渐衰落，其文化与汉文化渐渐交融凝聚，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当时官修史书对西南地区风俗的记述也更偏重于当时，而非古代，

且由于时局多变，中原政权无暇顾及西南边地，故对有关西南族群的记录极少，且往往汉、夷并述，将整个西南族群视为“蛮夷”。这是魏晋时期官修史书记述西南族群时的最大特点。

魏晋时期现存典籍中记西南史事者，以东晋时期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为最详，史料保存也最为完备。与正史零散而稀少的记录相反，《华阳国志》中所载西南史事十分丰富。该书作者常璩，生于蜀地，早年仕于成汉，对西南地区史料、风土十分熟悉。是以该书史料大多取材于汉晋时期士人著作及常璩实地访查所获资料，史料价值极高。常璩后仕东晋，因未受重视，便一心著史。其自称曰：

恨璩才短，少无远及，不早援翰执素，广访博咨，流离困瘁，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剿灭者多。故虽有所阙，犹愈于遗忘焉。<sup>28</sup>

应该指出，常璩先后仕于成汉与东晋的经历对他的夷夏观念及历史意识有着较大的影响——衣冠南渡后，南方士族崛起，成为东晋王朝实际的控制阶层。一方面，北方游牧族群建立起了诸多政权，开始对“华夏正统”形成强烈冲击，南方士族不得不承认南北割据的现实；另一方面，南方政权仍以华夏正统自居，重用中原故族，轻视蛮夷族群及巴蜀之人。常璩入晋之后，由于未受重视，仕途渺茫，用数年时间撰成《华阳国志》，洪亮吉将其与《越绝书》并称为地方志之始。<sup>29</sup>其中有《南中志》一卷，文中专记南中史事，资料翔实可信。凡九千余字，前段记南中史实，后段述各地地理政区沿革及人物。与官修史书不同，《华阳国志》体现出了常璩强烈的地方乡土认同意识，他在《序志》中说：

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曩遭厄运，函夏滔堙，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殄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反侧惟之，心若焚灼，惧益遐弃，城障靡闻。乃考诸旧纪先宿所传并南裔志，验以《汉书》，取其近是，及自所闻，以着斯篇。又略言公孙述、《蜀书》、咸熙以来丧乱之事，约取《耆旧》士女英彦，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凡十篇，号曰《华阳国记》。<sup>30</sup>

常璩的经历与陈寿十分相似，因此他的夷夏观念也与之相类，具有二元性。从文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认可中原中心观之下的“夷夏有别”观念，但同时又将巴蜀视作是与中原一般无二的华夏区域，他在序传中反复提及“三州”（梁、益、宁）这一概念，反映出了他强烈的乡土情怀与国家认同感。在《序志》中，常璩记录了自己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及写作过程。常璩深刻认识到西南地区是大一统国家之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历史事实与现实存在，因此在文中刻意凸显出了自己作为西南士人的国家认同意识——这正是他“验以《汉书》”，将西南“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的史事进行了完整书写的根本原因。

常璩的这种夷夏观念，在《南中志》中有着更为完整的表达，史载：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规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皆曲头木耳，环铁裹结，无大侯王，如汶山、汉嘉夷也。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其俗微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口直。又与瑞锦、铁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sup>31</sup>

在常璩看来，南中在昔日是“夷越之地”，其俗“编发左衽”，这与当时的华夏之礼有明显不同。然而常璩的视野并未局限在历史上的西南族群，而是更多放眼于当时“中国”体系下的夷夏族群的互动与文化凝聚。《南中志》中的“南人”仅指西南地区的汉人，即“南中大姓”统领的汉人移民群体及其后裔，而“夷”则是“编发左衽”的边疆族群，是夷帅统领的“夷人”。在特定的“夷汉杂居”这一历史背景下，两者实际上已通过通婚、结盟等方式成为政治共同体，即结成了所谓“百世遑耶”。<sup>32</sup>在常璩笔下，蛮夷虽与华夏仍有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了“向义慕化”的态度和趋势，而绝非春秋时期楚国与中原王朝之间那种

“我蛮夷也，不与中原之号谥”<sup>33</sup>式的文化对立。随着汉文化的传播以及地方政权的经营（如诸葛亮治理南中），蛮夷与华夏正在走向凝聚与融合。常璩所书写的“夷”对于汉礼的敬慕（“夷甚重之”），实际上也表现出西南族群对华夏之礼的认可，以及对国家“大一统”的明确认同。

总体而言，《华阳国志》反映了自汉末以来至南北朝初期的西南地区士人阶层较为普遍的一种夷夏观念。这种观念首先是建立在“大一统”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前提下，西南地区的“夷”与“夏”之间不再是完全隔绝的两个“别种殊俗”的群体，而是在动态的凝聚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具有共同政治意识与道德文化倾向的地方族群。这是华、夷族群凝聚的直观表现，也是魏晋时期“用夏变夷”思想的具体现实途径。应该说，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士人从西南自身的视角出发来描述这一过程，这既是对国家“大一统”理念的追随，亦是对于西南“故土”情怀的自我表达与书写重塑。这两种并行意识构成了《华阳国志》中夷夏观念的完整内核。

将魏晋时期史籍与前四史进行对比，可以清晰地呈现数百年间史家关于西南族群身份书写方面发生的变化。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史家对西南族群的认识随着夷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成为最主要的诱因：当中原王朝选择“用夏变夷”的开发策略，汉人移民大量进入西南，西南地区的族群结构逐渐产生了变化。<sup>34</sup>在此条件下，史书对西南族群的记载就更为细化和具体，由此产生了“夷夏杂居”说；与之相反，当中原王朝采取“严华夷之辩”的策略时，西南与中原的互动减少，史书对西南族群的记载也就逐渐转向了“蛮夷”说。所以，史书书写的差异，首先是由中原王朝的治边策略以及西南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其二，出身西南地区的史家，相较其他史书作者更具有地方意识。《三国志》作者陈寿、《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早年都生于蜀地，早年经历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对西南族群有着更为直观而深刻的认识。<sup>35</sup>在具体的书写中，出身西南的史家往往会将西南族群视作“夷”“夏”交融的地方群体，而其他史家则通常会将西南视作一个蛮夷聚居区。但这并不是说两者对“夷”“夏”身份的界定有着不同的标准，在传统史家笔下，“礼”是区别夷、夏的唯一标准，书写的不同仅仅与作者的经历与所处的视角有关。

其三，从总体趋势来看，早期史家笔下的西南族群与中原族群始终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史家对西南族群的书写也是随之而不断变化的。“用夏变夷”思想自先秦时期以来，在历代治国政策中都有所体现。<sup>36</sup>随着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持续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水平与文化也在发生改变，在此过程中，中原对西南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转变，反映在史书的具体书写中，整体呈现出一种蛮夷地区逐渐汉化的过程，这是早期史家在“用夏变夷”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书写意识。

总体而言，魏晋以来史书对西南族群及其风俗的书写，有意识地凸显了蛮夷族群的“汉化”，即强调在中原王朝的“教化”之下西南族群的变化。而对于“殊俗”和“异种”，总体上采取了贬斥的态度。这是“用夏变夷”与“礼别夷夏”等传统夷夏观在族群书写中的真实反映。

### 三、王朝国家早期的历史意识与西南族群书写

夷夏观作为一种历史意识，是古代中原王朝地区的人们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产生的。在王权国家建立之初，随着国家疆域不断发展，中原地区的人们开始有能力和机会接触到更远、更多的其他族群。语言、风俗的差异是族群之间必然存在的现实，如《礼记·王制》所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即是最直观的例证。<sup>37</sup>

族群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如何将不同族群合理地纳入“大一统”书写的范式之下，是古代史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sup>38</sup>“夷夏”二元书写便是在这一问题之下产生的。需要明确的是，“夷夏”二元书写实际上与早期“大一统”思想并不矛盾。在“服事制”观念引导下，只要王权可以通过藩属体系对“夷”进行册封，从而在名义上对“夷”拥有合法统治权，那么史

书中所呈现的“夷”这一群体就是“大一统”国家的“王臣”，无论文化是否一致，“大一统”书写依然是成立的。但是，“大一统”观念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从先秦时期《春秋公羊传》最早提出“大一统”这一概念以来，“大一统”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春秋公羊传》云：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sup>39</sup>

这里所称的“大一统”强调的是以王权为核心的统一政治结构以及政令的整齐划一。至《汉书·王吉传》则云：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sup>40</sup>

到了宋代，胡安国则认为，“大一统”的内涵并不止于此，《胡氏春秋传》载：

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王正月之定于一，何也？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道无二致，政无二门。故议常经者黜百家尊孔氏，诸不在六艺之科者勿使并进，此道术之归于一也。言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书，而变礼乐、革制度，则流放桀纣之刑随其后，此国政之归于一也。若乃辟私门，废公道，各以便宜行事，是人自为政，谬于《春秋》大一统之义矣。<sup>41</sup>

按照胡安国的阐释，这时“大一统”概念实际上已经指向了王权、制度、文化的全面统一。在这一范畴之下，“夷”仅仅作“王臣”不能令“大一统”国家的书写要求得到成立，“夷”这一群体在文化上的异质性问题就被凸显出来。族群文化的差异与“大一统”观念所要求的全面统一在文本书写中是存在矛盾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夷夏有别”（华夷之辩、礼别华夏）和“用夏变夷”作为不同时期的历史意识逐渐在历史书写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发挥了必要的补充指导作用。

仍以西南族群书写为例。早期西南族群的活动区域地处“天下”的最外围，属于“荒服”“要服”地区。《史记》作四夷列传，其中《西南夷列传》大致记载了西南夷的习俗，并叙述了庄蹻“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的过程，最终以“滇受王印”作为结局，完成了“大一统”的书写，在这一时期，夷夏文化的差异性尚未对“大一统”书写构成直接影响；《汉书·叙传》中虽然提出了“西南外夷，别种殊俗”，即强调“夷”“夏”风俗存在的差异，但在“服事制”观念的作用下，“滇受王印”和“置益州郡”依然可以作为“大一统”书写成立的历史凭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中大姓崛起，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逐渐疏离，但史书中以“遥领南中”作为依据，以此来维系史书中“大一统”书写的完整性。

因此，汉晋时期史书的书写中强调“夷夏有别”，本身并不会对“大一统”书写构成绝对的影响，同时，在“用夏变夷”的书写之下，西南族群的汉化就是完成“大一统”书写的必要补充之一。但随着边疆族群开始入主中原，文化的差异对传统“华夏正统”观念构成了巨大威胁，史书中的“大一统”书写就开始受到强烈冲击，例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就以“礼崩乐坏”来描述这一历史现象，强调五代以来蛮夷入主中原之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大一统”衰落现象。<sup>42</sup>在这一历史经验的指导下，史家的历史意识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华夷一家”就作为历史意识成为了历史书写的补充指导。

## 四、结论

历史意识作为史家回顾历史时的精神活动，对历史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汉晋史书对于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反映出，史家秉持的历史意识受到了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传统夷夏观念的双重影响。两汉以来，汉人移民不断进入西南，夷汉杂居已成为基本事实。在这一基本的长时段历史背景下，史家逐渐产生了“夷夏有别”和“用夏变夷”两种夷夏观念，并进一步影响了史家的历史意识。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王朝国家时代的史书编撰过程中，“大一统”思想之下产生的历史文本整体呈现出了王朝国家时期的基本历史理性：即历史意识与历史规律的逻辑统一。

要指出的是，王朝国家时期史书的历史书写，大多注重现实政治的需要，这是统治阶层为了塑造自身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必行之策，也是史学最主要的政治功能之一。汉晋时期，史家对西南族群的书写目的十分明确：历史叙事首先是为中原王朝的统治合理性服务的，最核心的目标是建构当代历史的“大一统”叙事逻辑，在此基础上为当代王朝做出统治合理性的解释。“大一统”作为一种先秦以来的政治理想，具体表现为作为“大一统”国家主体的“王”（天子、王权）与客体的“臣”（民众）和“天下”（国家疆域）之间关系的长期恒定。在这一宗旨下，汉晋史书以“大一统”作为出发点完成了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诚然，史家由于所处时代背景和身份的不同，其对西南边疆族群所采取的叙事倾向有所差异，在具体的书写中呈现出“用夏变夷”和“严华夷之辩”两种不同路径，但这两种书写倾向呈现出了辩证统一的关系，都肯定了自汉代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以鉴古喻今的书写方式参与现实世界秩序的建构，形成了在“大一统”思想下的族群书写完整范式。

从特征上来看，汉晋时期史书对于西南族群的书写，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蛮夷”向“南人”转变的过程：西南族群的风俗既有与汉俗的融合，又保有区域自身的特点，整体上与汉俗是有差异的，即所谓“异域殊俗”。历代对“蛮夷”这一族群的风土民俗的书写是随着夷夏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蛮夷与华夏的关系，本质上而言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的互动关系。在历史的演进中，西南族群不断与其他族群产生交融与凝聚，形成了后世的西南诸族，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在历代史书中也得到了完整的书写和反映——“异域殊俗”“夷夏有别”所反映出的是族群之间文化的“多元”，而“向义慕化”与“用夏变夷”则将这种差异最终引向了族群文化的“一体”。这种文化层面的族群凝聚本身是超越了某个具体王朝的，认同“天下”与王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文化走向一体格局的真实历史轨迹，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又璀璨多姿的根本缘由。

#### 注释：

1 国内学界关于历史意识应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成庆：《晚清的“进化”魔咒：严复历史意识的再考察》，《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江涓：《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肖俊毅：《“法先王”与先秦儒学的历史意识》，《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王灿：《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东方论坛》2013年第1期；王灿：《华夏历史意识、“一元”史观及现代民族意识》，《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燕永成：《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陈金海：《〈尚书〉的历史意识及其普遍主义情怀》，《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综合而言，学界将历史意识应用于史学范畴中的研究成果集中在研究某一史家、史著或特定时代的具体历史意识。

2 国内学界对于历史意识相关的理论研究已有一些较有价值的成果，如徐兆仁探讨了历史意识的实践价值，参见徐兆仁：《历史意识的内涵、价值与形成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何伟平探讨了西方历史意识的发展与解释学循环的关系，参见何伟平：《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陈立新梳理了历史意识的本性，力图从哲学存在论的原则清理历史意识的存在性质，参见陈立新：《让历史意识真正出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刘华初探讨了历史意识的整体性之于历史的整体性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意识自身的历史也是具有整体性的，参见刘华初：《试论历史意识的整体性观念及其现实意义》，《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张广生、张彦丽在思想史范畴中解释西方历史意识的来源、构成及其所编织的自我认同的内在矛盾，试图批判地超越西方自我确证的有限逻辑，重获认识和建构自我身份的能力，参见张广生、张彦丽：《历史意识与西方的自我认同：思想史的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3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4 国内史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吴楚克、王浩：《魏晋南北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关键期》，《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苍铭、张宏超：《从历史观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王琨、李良品：《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广西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史金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当代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总体而言，史学界在中华

---

民族共同体理论框架下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两种研究路径。

- 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991 页。
- 6（西汉）司马迁：《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第 2993 页。
- 7（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90《乌桓鲜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992 页。
- 8（东汉）班固：《汉书》卷 95《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843 页。
- 9（东汉）班固：《汉书》卷 100 下《叙传下》，第 4268 页。
- 10（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 6《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22 页。
- 11（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 6《三国志》，第 122 页。
- 12（晋）陈寿：《三国志》卷 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831 页。
- 13（晋）陈寿：《三国志》卷 33《蜀书·后主传》，第 894 页。
- 14（晋）陈寿：《三国志》卷 42《蜀书·谯周传》，第 1030 页。
- 15（晋）陈寿：《三国志》卷 43《蜀书·李恢传》，第 1046 页。
- 16（梁）沈约：《宋书》卷 69《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20 页。
- 17（南朝）范晔：《后汉书·狱中与诸甥侄书》，第 2 页。
- 18（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6 页。
- 19（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6 页。
- 20（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6 页。
- 21（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44 页。
- 22（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61 页。
- 23（南朝）范晔：《后汉书》卷 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 2860 页。
- 24（东汉）班固：《汉书》卷 72《王吉传》，第 3063 页。
- 25（唐）李延寿：《北史》卷 100《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3343 页。

---

26 徐文德：《晋宋齐梁诸书纪、志、载记、传（节录）概说》，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页。

27（梁）萧子显：《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03页。

28（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2《序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3页。

29（清）洪亮吉：《重修澄城县志序》。参见戴治修、洪亮吉、孙星衍纂：《（乾隆）澄城县志》卷20《序录》，《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编》第2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30（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2《序志》，第723页。

31（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2《南中志》，第229、247页。

32 “遑耶”系彝语音译，大意指“一家”或“结盟”“姻亲”，这一点已是学界的基本共识。详见王继超：《“遑耶”一词的彝语含义及功用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3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92页。

34 彭丰文：《从两汉西南夷经略看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35 关于常璩史学思想的研究，参见杜治文：《〈华阳国志〉的史学思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S2期。

36 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

3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2《王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9页。

38 于逢春指出，司马迁以黄帝为“源”，对夷狄、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建构。参见于逢春：《华夏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笔者认为，无论司马迁使用了何种方式，核心目的是为了建构“大一统”的书写范式，即将不同族群纳入“大一统”国家的叙述范围之内。

39（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隐公元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0页。

40（东汉）班固：《汉书》卷72《王吉传》，第3063页。

41（宋）胡安国：《胡氏春秋传》卷3《隐公下》，第8-9页。

4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7《晋家人传第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页。